



□ 郝良华 曲晓萌

《呻吟语》，明代末期语录体清言小品的优秀代表作品。“呻吟语”涉猎广泛，纵谈古今天下、身心家国、人情物理，体悟性强，反映出作者对社会、政治、世情的体验以及对真理的不懈求索，开启了明清之际救世启蒙先导。《呻吟语》作为一部明达体用之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先后被翻译成2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发行。

（一）

《呻吟语》的作者吕坤（1536—1618年），明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字叔简，号新吾，自称抱独居士，人称“沙随夫子”，河南商丘宁陵人，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历官山西襄垣知县、山东参政、右金都御史、山西巡抚等。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病逝，明天启元年（1621年）被朝廷追封为刑部尚书。吕坤为官刚正清廉，崇真尚实，体恤百姓疾苦，深受百姓爱戴。因不满明朝政治中的各种弊端，称疾乞休，居家20载，以著述讲学为务。《明史·吕坤传》评价其“刚介峭直，留意正学。居家之日，与后进讲习。所著述，多出新意”，与沈鲤、郭正域被时人称为万历年间“三大贤”。他讲求“实用”“事功”，推动社会改革，躬行地方实践，其批判封建专制弊端、倡导学校议政、维护妇女权益等新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进步影响，是明清救世启蒙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其唯物主义思想被载入《中国思想史》。吕坤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呻吟语》《去伪斋集》《实政录》《交泰韵》《四礼疑》《四礼翼》《闺范》《忧危疏》等。

（二）

《呻吟语》完成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吕坤所处的时代，政治危机日趋严重，赋税沉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明朝的统治病入膏肓。吕坤痛感当时社会种种弊端，主张兴利除弊，致力于励精图治、教化民风，积30年心血完成了济世良方《呻吟语》。他在序中写道：“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故以“呻吟语”命名。《呻吟语》分内篇、外篇共6卷，涵盖了礼、乐、

射、御、书、数6个方面，论述了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等诸多话题。吕坤在学术上“以自得为宗”，不拘门户，出入百家。他在《呻吟语》中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称自己的学说既不是道学、仙学，也不是释学、老庄申韩之学，“我只是我”，自成一派。该书有四大特点：一是文风贴近口语，不虚谈高远，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益人智慧。如“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难”。二是以笃实为本，务求规矩，有感而发，含蓄蕴藉。如“心要虚，无一点渣；心要实，无一毫欠缺”。三是言简意赅，概括精当，有的三言两语，却洞彻精微，灼见新意。如“无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业”。四是语言生动明快，真切传神，善于运用比喻、对偶、排比、拟人、夸张、反问等多种修辞格，富有韵味和力量。如“无所乐有所苦，即父子不相保也，而况民乎？有所乐无所苦，即戎狄且相亲也，而况民乎？”句式长短错落有致、和谐优美，充分契合了“言语以简真真切为第一”的观点。

（三）

《呻吟语》具有显著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因素与倾向。吕坤的思想核心为“气本论”，蕴含诸多唯物主义思想成分。书中认为“气无终尽之时，形无不毁之理”。气是万古长存的，形是暂时的、要毁灭的，但这种毁灭只是“气”从一种物质形态转向了另一种物质形态。书中还提出了“气化无一息之停”“运动守恒”的观点，有“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的思想倾向。“天地万物所赖以常存者‘恒’故耳”，运动的守恒是物质所具有的普遍规律，“气”守恒运行的规律和天地万物守恒的运行规律是统一的。其宇宙生成说，坚持用“道本自然”的气化学说来解释天地、人和万物的形成，把三者的生成看作是物质实体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卓越的哲学见解，十分可贵。此外，书中还具有许多辩证的思想范畴，这也是一笔宝贵的理论遗产，主要反映在自然、当然和偶然说中。“自然”又称必然，书中用它

来表示客观事物或自然现象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趋势，也就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如“阳亢必旱，久旱必阴，久阴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谓自然”。“当然”表示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道德规范的实践，是“性分之所当尽，职分之所当为”。“偶然”则表示不合常规的少数例外的反常现象，如“小役大，弱役强，贫役富，贱役贵，此之谓不得不然”。作者认为自然、当然、偶然都是宇宙的具体内涵，都具有客观存在的意义，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必然性和现实性得到了统一。

《呻吟语》中的民本思想开启了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潮的先河。书中明确提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和历史发展变化的决定力量。“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故耳。”书中还提出了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的观点，“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却又没有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倡导“民主君仆、民体国用”。这种重视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中地位与作用的思想在理论上更为深刻。与此同时，吕坤对自己所属阶级的剥削本质也有着深刻的反思，“我亦轩冕徒，久股民膏脂”。他对于民间的种种疾苦，有着深刻的洞彻，有着深厚的同情，更有着拯救的实政措施。首先，他奋起抨击和揭露了君主专制自私、贪婪的真面目，矛头直指封建君主，在政治思想上倡导“以理抗势”，具有限制君主过度极权专制的进步意义。书中认为，封建君主虽掌握着天下最高的权势，但也应该有所约束和畏惧，天下所有权势必须接受天下公理的制约。吕坤也正是因“以理抗势”，触怒万历皇帝和权臣，不得不托病辞官，隐居林下20余年，再也不被起用。其次，书中提出要缓解社会矛盾，必须首先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让人们能够生活下去。吕坤认为“此富民为王道之首务也”，而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就在于“足民”，“足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万政举；百姓不足，万政废”。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尤其在明中晚期封建专制日趋强化、政治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作者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该思想开启了黄宗羲、唐甄等人的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潮的先河，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

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其民本思想毕竟是封建时代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总体上没能摆脱君主政体认识的桎梏。

《呻吟语》浸润了吕坤对立身、处世各种充满哲理的思考。比如，书中主张在与人的相处时，不要针对人的弱点、敏感点而与其相争，要遵循“五不爭”的处世原则：“不与居积人爭富，不与进取人爭貴，不与矜飾人爭名，不与簡傲人爭禮，不与盛氣人爭是非。”书中还谈了如何待人的问题：“責善要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心。”做事情，应对事务，就涉及跟人打交道，要因人制宜，注重方式方法。书中指出人际交往一定要遵循人的“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则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则何所不失？不惟帝王为然，虽二人同行，亦离此道不得。”就是说，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只有保持着人的自然之情，世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认可你、接受你、信任你，乃至喜欢你、尊敬你。在《养生》篇中，吕坤提出“养德”乃“养生”第一要务，并诙谐地告诉人们，“二陈”“四君子”等草药汤羹虽对于调养身体确有功效，但以清心寡欲清淡之方为最佳。书中开出的养生之方超出了物的境界，认为“养德”“养心”方是“无价之药”。

《呻吟语》是一部极具思想深度的力著，对后世的儒学发展和文化传播有重要贡献。它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精神，又开拓了儒家的新境界，映照出吕坤这样一位有着多种思想侧面、自诩为“新吾”“抱独”的学者征服自然、自我完善和积极进取的时代光芒。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家颜元，读罢《呻吟语》后叹服曰：“近世大儒也。”在吕坤去世逾200年之后，1826年（清道光六年），朝廷应礼部呈请，准许吕坤入祀孔庙西庑，成为受到奉祀的先贤先儒之一，是清代官方认定的一代“真儒”。



清代嘉庆《增修宜兴县志》详细记述了南宋时期朱熹写《常州宜兴县社仓记》这篇文章的经过：江苏宜兴县令高商老为解决本县的灾荒，设立了社仓。朱熹对社仓的设立、实际运行存有一些疑虑，但是经过长期观察，他发现社仓确实是在赈灾中突显出了其独特功用，最终深表赞许。当时，社仓的设立不仅在赈灾中有效调剂了灾民的粮谷，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举措将救灾与劝农促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如此真正实现由社仓的“他救”到农民的“自救”，最终实现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良性循环。

这篇《常州宜兴县社仓记》成文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三月十六日，这一年，朱熹已是60多岁。何以一个小小的宜兴县社仓竟让朱熹如此刮目相看？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南宋时期的“社仓”这个公益性救济实体的由来。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正在福建崇安家中侍奉他的老母亲。之前从乾道四年（1168年）开始，福建北部建阳、崇安、浦城一带因为灾荒严重，遂出现了缺粮少食饥民骚动的情况。看到这一情况后，朱熹便找到崇安知县及其他乡贤，发动富庶之户拿出自家存余的粮食集中在一个地方，以市场最低的价格来赈济灾民，缓解灾荒造成的吃饭问题。之后，当地便在朱熹的倡导下设立社仓。社仓的运作方式是：头年秋冬之时，从富庶之户拨出余粮存于仓中，到了次年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拿出这些粮食接济灾民，赈放乡里。而灾民在得到救济之后，他们在次年也因此得以恢复生产，重回正常生活，不至于发生次生的灾情。社仓这个民间公益性仓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仓在救济灾荒上的不足。后来，崇安人民为纪念朱熹而称之为“朱子社仓”。这也是为什么朱熹如此充满感情地来称道宜兴的社仓，并著文详述的原因。

在《常州宜兴县社仓记》里，朱熹开头就讲了他20多年前创建社仓的经过和目的。后来孝宗赵昀知道这件事后，便颁发诏书加以推广。但是当时积极响应的人不多，只有福建的赵汝愚、宋若水执政的几个县借鉴了。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高商老任宜兴县令后，他积极响应朝廷号召，先后建了11个社仓，存储的米达到10余万斤之多。为了保证这些救灾粮食斤两无差地发放到灾民手中，高商老遴选了乡里公认的赵善石、周休等20多位贤达人士加以管理。当时承义郎赵善石、周休、周世德就给朱熹写信，请他撰文表彰这件事情。作为社仓创立者的朱熹也思忖著文以记，奈何却迟迟没有动笔。后来浙江西部先后发生了水涝和旱灾，常州一带饥民尤其多，当时夏粮未收，所以宜兴灾民只有依靠领取社仓的粮食济困了。在朱熹看来，确保社仓的粮谷发放固然重要，更为关键的是，如果次年这些受到救助的灾民未能偿还所借粮谷，社仓也就不能继续有效运转。这也是他之前没著文表彰的主要原因。朱熹还需要再观察社仓的实效究竟如何。

到了第二年，宜兴县令高商老将调任其他地方，朱熹在与赵善石、周休的书信来往中得知，自己所顾虑的一切并未发生。因为社仓在对灾民救济的同时，劝农自救生产实现自足是在赈灾时同步展开的，故而实现了收储良性循环。从此情况来看，这个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善政可以著文予以表彰了。可朱熹还是很慎重，他在文中仍然表达了对社仓能不能长久坚持下去的担心。

俗话说：有治国的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治国之道。以往的中国传统，是让老百姓耕种3年粮食，必须要有1年的蓄积，故积30年，则必须有10年的蓄积，这样老百姓才不至于出现饥荒，这个才可谓万

朱熹《常州宜兴县社仓记》成文前后

□ 陈永跃

世良法。在汉代虽也设立类似救灾“常平仓”之法，立意虽好，但到了宋代，也只有法令、簿书和仓库的钥匙放在那里，无人问津。这是为何呢？良法的生命在于执行，如果没有人公而忘私持之以恒推行，则法令徒为法令。更何况这样的民间社仓，聚集粮食在乡间荒闲之地，又没有官吏主管。朱熹担心，如果没有高商老这样负责的县令和忠信无私的20多位宜兴乡贤同心同德，并心一力，这样的社仓还是很难持久发挥功效的。“苟非尝得聪明仁爱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数公者，相与并心一力，以谨其出入而杜其奸欺，则其法之难守，不待他日而见之矣。”这是他自己创立社仓的亲身体验。现在，朱熹把这些情况都记在这里，以告知后来从事和管理社仓事务之人引以为戒。这就是被收录在《朱文公全集》和《重修宜兴县志》中的《常州宜兴县社仓记》成文的前后经过。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在朱熹《常州宜兴县社仓记》著文以后，宜兴这个在西晋以三兴义兵平乱得名的古县，自南宋以降一直以朱熹的表彰为激励，在明朝继续设立常丰仓、预备粮储仓、济农仓、东仓、南仓、县库，到了清朝还有架阁库储备粮食以应饥荒。而当年这件被朱熹称赞的义举，则一直被此地的群众传承不息。



（四）

“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以“二十五街、两市、一百零八坊”的记述结构，将盛唐长安的吉光片羽跨越千年的时光一点点为我们勾勒出完整的型廓。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那里是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我的故乡。”而今滴水之滨，习近平总书记以铿锵迸发的昂扬热情倡议了“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美好景愿。雁塔晨钟、骊山晚照，万国衣冠色，千载钟鼓鸣。闭上眼，仿佛看到了安远门外、长亭古道、沙漠瀚海，商团使节们自西而来，驼铃的音符却在向东敲击着深沉而热烈的情感，历史的回音宛若萦绕耳际。



『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

□ 杜鑫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中亚峰会”论坛上的谆谆之语既是对“中国—中亚”横亘千年的守望相助之谊的深切肯定，更是引领我们站在八川宏阔、唐章经典的长安城上远眺西去的驼铃古道，神思这座承载了千百年历史文化风韵的神州古城。

（一）

《长安志·序》之开篇，“雍之为都，涉三代，历汉唐之全盛”。作为十三朝古都，关中以长安为中心的八川之地历来英雄伟事辈出，西周时期，“文王邑丰，武王迁镐”；秦始皇“八表同风，开启中华大一统”；两汉时期，长安又成为了“南北纵越，东西联轸”的华夏中心；更是在盛唐开元之时，成为了全世界向往的“上京天都”。

长安积聚十三朝帝王之气，皇都烈烈，对其记述与一般的都邑志不同。宋敏求在《长安志》中脱出一方地理、人物、故事的记述体例，统合古今，网罗各时各地之风采。以唐京城为例，按照地理方位，先述东市包

括东市所辖诸坊，再述西市及所领诸坊，一百零八坊的街市规模，市场盛况、官邸府第兴废的典故，读来历历如绘。《长安志》至今仍是研究古代长安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

（二）

“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根据《长安志·卷七·唐京城》所载，“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周礼》王城动九逸之制，隋《三礼图》见有其像”。唐长安城以“宫城”“皇城”“外郭”三部分组成。宫城位于城北正中之处，属皇家殿阁；皇城属城南，为百官衙署所在地；外郭即是位于前二者东、西、南三面的百姓居所和市场集散地，共一百零八坊并东、西两市。

东市近太极宫、兴庆宫，内以“九宫格”样式排布，据《新唐书》《酉阳杂俎》等记载，郭子仪、李林甫等朝廷重臣均有造宅于此。宋敏求在《长安志》中如此记述东市：“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较于东市的贵气雍容不同，这里人流客源众

多，除了国内客商，还有大量自域外而来的“胡商”。各色珍奇琳琅满目，胡旋舞、戴竿杂技各种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李白诗云：“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宋敏求在编撰《长安志》的过程中，参照了很多唐人所写的笔记史料，如《酉阳杂俎》《续玄怪录》《南部新书》《大唐新语》等，频繁出现“西市贾胡”“西市波斯邸”“西市商胡”“西市胡”等。由此可知，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西市与商胡已混融成一体。近年来，在西安及邻近地区发现的众多粟特商胡的墓志，可与传统文献记载的唐代长安商胡云集的盛况相互印证。

（三）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汉唐风。”唐长安西市多民居、广市集，加之距离长安城“西壁三门”中的安远门最近，以承天门作为中轴线西侧的长安县与西市就成了自西域而来的胡商住马歇脚之地。《长安志》记载：“棋布栉比，街衢横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安史之乱后，安远

门改名“开远门”，以此譬喻为通往丝绸之路的起点，表达开拓进取的恒心。

长安作为丝绸之路上四方来客游历或居住的首选之地，形形色色、纷繁复杂，有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使臣、质子等，也有漂流的僧人和艺人，更有兴贩逐利的商贾。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将近四百个。来自突厥、昭武九姓诸国、东罗马等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各地人们的奇装异服，使长安人眼花缭乱。《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到开元初“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装露面，无复障蔽”。

在外来人大量聚集的同时，外来的货物也汇聚在了长安，最著名的是“金桃”，果实“大如鹅卵，其色如金”。贞观十一年，康国遣使“献金桃、银桃”，太宗“诏令植之于苑圃”。唐朝人不论男女，都讲求名香薰衣，香汤沐浴。据官私记载，唐朝进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檀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与哇爪香、乳香、没药、丁香、青木香、广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米香、芦荟等众多品种。